

开放前沿的 文化震荡

——“三资”企业多层次文化冲突剖析

路英浩 著

244.3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集人

封面设计：袁亚雄

开放前沿的文化震荡

——“三资”企业多层次文化冲突剖析

路英浩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210,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2-00937-X/G·85 定价：4.05元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的浪潮	(1)
一、“三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体制新格局形成过程中 的作用.....	(1)
1.历史的反思和时代的姿态.....	(1)
2.瞩目的成果.....	(10)
3.“三资”企业在我经济体制新格局形成过程中 的作用.....	(16)
二、“三资”企业状况分析.....	(23)
1.“三资”企业的地区和人员分布简析.....	(23)
2.“三资”企业产业结构分析.....	(29)
3.外商投资来源分析.....	(33)
4.外商文化背景分析.....	(39)
第二章 多层次的文化冲突	(52)
一、多层次的文化.....	(52)
1.有关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52)
2.多层次的文化.....	(64)
二、显型文化的冲突——令人难堪的误会.....	(76)
三、价值观、行为规范的紊乱.....	(82)
1.劳动观念的扭曲.....	(82)
2.在效率面前的失落.....	(91)

3. 外延行为方式的失调·····	(98)
4. 消费观念的错位·····	(108)
5. 困惑的人格类型·····	(121)
四、认知模式的反差·····	(133)
1. 交换理论与劳动力属性的认知困境·····	(133)
2. 平等乎? 平均乎? ·····	(142)
3. 企业人际关系的认知怪圈·····	(152)
4. 科层观念和合理性的迷向·····	(162)
五、制度性文化的摩擦·····	(169)
1. 从规范到法律·····	(169)
2. 神秘的董事会·····	(173)
3. 人事制度的分歧·····	(181)
4. 招聘解雇的障碍·····	(189)
5. 企业运行机制的阻碍因素·····	(198)
6. 利益性组织的目标导向回归·····	(213)
第三章 文化的扬弃和超越·····	(226)
一、全方位的视野——克服文化冲突的国际 范例分析·····	(226)
二、文化的调适·····	(231)
1. 文化的选择机制·····	(231)
2. 积极的文化继承观·····	(239)
3. 特质组合——文化调适的结晶·····	(250)
三、文化的超越·····	(263)
1. “三资”企业的窗口效应·····	(263)
2. 未来的展望·····	(268)

第一章 时代的浪潮

一、“三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体制新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1. 历史的反思和时代的姿态

本世纪70年代的末两年，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领导层，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选择：中国将敞开她的胸怀，积极向世界开放。

这是一个明智而深邃的选择，它顺应了世界性潮流的趋势。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必定逐步取代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足状态。历史已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作了深刻的注解。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正是在开放与反开放的世界性较量中展开的。

18、19世纪，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文明随之令人眼花缭乱地发展起来。尤其在英国、工业繁荣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帝国主义阶段终于开始到来，殖民地经营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为了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取得殖民利益，便加紧向全世界扩张。在亚洲，蚕食鲸吞印度，而它的近

邻，一个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皇朝的命运，自然就岌岌可危了。与西方繁荣正相反，跨入19世纪后，清朝政府已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土地兼并且烈，农民破产剧增。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①

事实恰恰如此，近代史上，闭锁的中国门户，不得不在罪恶的鸦片贸易挖空了中国闭关政策墙脚的时候，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

自中国古老的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的那刻起，中国便被西方资本主义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的行列。在这次深深的大震颤中，天朝尽善尽美的梦幻破灭了，人们开始冷眼看世界。新式学校和翻译出版机构纷纷建立，大批留学生远涉重洋，求学他乡。由英国人马革里等督办的那一类新式企业，或是由官督商办，或是由商办也开始陆续出现。

中国近代的门户洞开，客观上，使得西方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西方在铁路修筑，现代交通运输方面的投资，现代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纷纷设立，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格局。西方对中国工矿业的投资，客观上塑造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雏形。1895年前，西方列强已在中国设立工厂80余家。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华设厂和开矿的权利，设厂数字猛增，1895年至1900年，各国在华设厂数增长到933家。1896年，西方开始向中国矿业投资。以后投资规模逐渐扩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6页。

西方在中国强行建立的租界，客观上震撼了封建皇朝的政体，使得中国社区体制开始由封建形态转向近代形态。“租界先进的市政设施，严格高效的市政管理，与中国原有城镇的落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催发了近代市民意识。租界是典型的商品社会，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向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提出了挑战。租界的政治制度，包括代议制度、行政制度，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的蓝本和教科书；租界的外资企业，在技术、资金、动力、人才等方面，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租界的学校、报刊、译书、传播了大量在当时中国还不失为先进的新学问，有助于中国文化近代化，有助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①居住在租界的各国侨民，由于他们在生产和生活等诸方面的需要，而同华人发生了日益广泛的接触，从而又在生活方式方面相互影响，拓宽了中外联系的渠道。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第一次进入了现代意义上整体性接触的时期。

然而，近代史上门户洞开给中国所留下的近代化痕迹，却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广州等5口岸和天津等11口岸的沿海地区及内河的20多个口岸的相继开放，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在上述地区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建立在一些通商口岸的租界制度，使得列强取得了税收、财政、交通及警察等的行政、司法权利。门户洞开，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行政管理权，屈服于丧失自己关税主权的关税协定，甚至还丧失了子口税（即内地税）的主权。帝国主义入侵者还夺取了海关行政管理大权，仅英国人赫德一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就长达45年之久。与此同时，中国的沿海贸易权

^①《文汇报》1988年9月13日第4版，“是罪恶的渊藪，还是文明的先驱”。

利和内河航运权以及内地通商权，也遭丧失。片面最惠国待遇，更使中国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向西方开放。列强对中国的政府贷款，成为勒索我国财富的绞索，利率高，折扣大，并附有政治条件。更为苛刻的是，这些贷款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对其最大的经济支柱——关税和盐税的控制。由此，中国财政的咽喉，便被列强所扼，致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附庸化。各国在中国取得的铁路修筑贷款权，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和警察权，使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而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业务，同样被西方诸列强轮船公司所垄断。

当我们冷静地反思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开放，客观上使中国在经济形态、生产技术、科学文化、都市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近代中国门户的洞开，却又使一个独立的国家丧失了主权。可见，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开放与反开放的世界性较量中，交织着这样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独立、一个是现代化。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完整而前仆后继，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但是，腐朽的政府不顾时势、安于落后的现状，一味地夜郎自大，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蒙骗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甚至以闭关锁国、封港禁海来抵制国外先进事物。这样，不仅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相去甚远，而且，最终连“维护独立”也难以如愿。

纵观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以后，落后国家的社会变革无不以了解和学习国外先进事物为开端。俄国本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17世纪，彼得大帝以船场学徒身份，亲自到西欧学习造船技术，游历列国，考察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俄国的兴盛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前提。19世纪60至90年代，对亚洲东部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在受到西方国家侵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于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运动，以西方先进国家为蓝本，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从而迅速强盛起来，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态。

相反，封闭导致了孤陋寡闻，闭关政策阻碍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助长了愚昧和妄自尊大的心理。葡萄牙人16世纪末来到中国，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古代音译），明清两朝官僚与他们多次打交道，连澳门也借给了人家，却长期不知道这“佛郎机”在哪里。《明史·外国传》竟然写道：“佛郎机，近满刺加（马六甲）。”明末清初，中国士人还把西班牙、法国都称为“佛郎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华，明清士人长期把荷、英混称为“红毛番”。至于西方传教人士介绍的世界地理知识，除徐光启等一些较早的开明人士之外，大多数士大夫只当是海外奇闻。清乾隆年间编修《清朝文献通考》对于世界五大洲之说，根本不信，认为不过是沿袭中国古代邹衍的“大九洲”的神话。孤陋寡闻是愚昧无知的孪生兄弟，愚昧又助长了妄自尊大的心态。即使在民族危机临头的时候，这种心理依然盛行。洋务派们仅仅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生产，极力反对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封建卫道士对先进社会形态的仇视，使中国面目依旧，失去了振兴国家的历史时机，自此，中国的落后状况不断加剧，不仅未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厄运，相反，国家的命运更加危急。

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夙愿，捍卫了民族独立，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本可以解决好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两难的问题：维护独立和面向世界开放以建设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西方

资本主义各国纷纷加入了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封锁的行列。50年代初，朝鲜战争烽烟骤起，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从此北纬38度线以南的半个朝鲜，对中国大陆关闭了大门。在南部，港英当局参与了当时的对华经济封锁，昔日以帆樯如林著称的转口贸易都市——香港，顿时成了不见船影的死港。美国的第七舰队游戈于太平洋的西岸，对中国实行东部海域的封锁。

唯有北部，门户还算敞开着，从苏联等东欧国家引进了400多个项目，其中主要是苏联的156项，包括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等项目，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许多骨干企业，对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从苏联贷款19亿美元，年息2.5%，1965年还清。60年代，苏联撕毁合同，对中国采取压制政策。我国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大大缩小。此后，我国对外贸易、引进外资重点从苏联等东欧国家转向西方。60年代后，外贸及引进外贸的80%是与西方进行的。如1962年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龙生产设备等，但是总的规模很小。且从1968年后，引进又遭中断。

这样，由于50年代西方的封锁和60年代苏联的压制，不利的国际环境，迫使中国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后，在国内，一种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观点开始滋长，并且在1966年以后的十年间盛行一时。

然而，正当中国国内许多人為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主观上妄自尊大的心态又开始膨胀的时候，一些曾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邻近国家和地区，则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开放的客观背景中，先后抓住了有利的发展时机，社会与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日本在本世纪50年代末，经济曾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而日本只占2.5%。1960年中日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并驾齐驱。但此后恰恰是当中国关起自己大门、经济在一次次政治动荡的夹缝中艰难跋涉的时候，日本却抓住了时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功后，经济迅速起飞。1979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1011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710美元；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升为1156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679美元。而同期的198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422.7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46.5美元。1980年日本的外汇储备为216亿美元，而中国只有23亿美元。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美国扶助因素外，自己大力引进国外技术和努力发展本国技术，为日本经济迅速接近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前提。1950年日本制定了外资法，并开始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大力推动了日本各领域的技术革新。日本引进的甲种技术(支付外汇，期限超过一年的项目)，自1950年至1974年的25年间共达15000多项，而且引进国外技术时，非常注意消化，一般在几年之后即能由国内生产。正是由于日本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环境，使日本经济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迅速起飞，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末为9.1%，60年代为11.3%，后者超过法国1倍，西德1.3倍，美国2倍，英国3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

与此同时，象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区和国家，也在经济开放的世界性浪潮的冲刷下，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投身于国际贸易的洪流，把握住时机而开始腾飞。当

中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低谷中步履艰难地徘徊的时候（198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列在37个低收入国家中的第23位^①），那些充分开放的东亚近邻却悄悄地在中国身边开始崛起。1979年南朝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634美元，而新加坡则已为3812美元了。

正如美国东西方中心出版的《亚太1986年报告》中所说的：“一个新的世界贸易、工业和财富的中心正在太平洋盆地的西端出现，与原先以北大西洋为基地的工业革命的中心相匹敌。”1988年1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批准了财政部长贝克的建议，决定提前4年，也就是从1989年1月2日起取消对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外贸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美国及其仿效美国做法的欧洲共同体，已经承认亚洲四小龙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发展成为不可等闲视之的对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以国防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我国的专家指出，估计80年代截至2000年的时期内，各国对世界市场份额的争夺仍将是十分激烈的^②。在生产、技术、科技、国民收入、社会生活诸领域领先的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优势开辟和争夺新的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面对这种严峻而又伴有机遇的形势，中国在沉思。曾经咽下过苦果的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向民众疾呼：“落后是要挨打的。”

富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和

^①《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②吴际坤主编：《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22页。

经验的基础上，毅然采取了开放的姿态，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79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从1980年起，给予广东、福建两省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而同期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后，我国还开放了整个海南省为经济特区。

1984年，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又迈出了更大的一步。5月15日，国务院宣布，我国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为进一步开放的城市和地区。同时，国务院批准扩大地方、部门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上海、天津两市有3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大连、广州有1000万美元以下的审批权；其他开放城市和内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5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及海南岛，给予投资者更多的优惠。^② 同年8月，我国海关总署、国务院和国家有关商业信贷主管机关相继宣布了我实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具体的新政策和措施。以后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40页。

^② 《1985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4页。

洲和闽南三角地带。①

这一切表明，我国将在新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把握最佳时机，为迎接环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崛起，创造条件，使我国早日跻身于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2. 瞩目的成果

我国政府的这一姿态和实际行动，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和世界经济舞台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从1979年起，我国改变了60年代以来基本不借外债的情况，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国际上目前通行的一些做法，吸收和筹集了一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或民间贷款，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并通过兴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开展补偿贸易、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合作开发其他资源等，直接吸收外商投资。同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一系列举动，立即引起世界的瞩目，许多国家纷纷作出反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业家、金融家纷至沓来，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以富有魅力的投资环境，吸引着世界上巨大的游动资金。从1979年国家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至1986年底，我国利用外资已签定协议金额累计达496亿美元，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达191.68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三资”企业中的协议金额达149.52亿美元，而到1987年底，外商在我国“三资”企业中的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达到184.57

① 《1986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5页。

亿美元。在实际使用外资方面，1979年至1986年底，累计已实际使用资金达284.2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为79.3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资”企业的金额为47.85亿美元，而1987年1年，仅实际使用“三资”企业的外商投资金额为21.3亿美元，所以至1987年底，已实际使用外商在“三资”企业方面的投资金额达69.15亿美元。^①而截至1988年5月底，我国已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410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200多亿美元。

在引进外资方面，1984年是具有重大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首次出现了吸收国外直接投资金额超过国外贷款金额。这一年，我国兴办的“三资”企业有741家，这样，“三资”企业从1979年至1983年累计5年的190家一下猛增至931家，1984年一年兴办的“三资”企业是前5年累计数的4倍。由此，它标志着“三资”企业的设立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的确立。

近十年来，“三资”企业的建立和经济实践在我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1) “三资”企业的纷纷设立，为我国经济建设引来了大量的资金，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亟需资金的不足。

我国的经济要腾飞，必须在交通、矿产、能源等基础领域中，奠定雄厚的实力；我国的经济要走向世界，必须使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技术工艺和管理水平；对外开放要持续深入，必须要有现代化的环境，因此也必须在城市基本建设（道路、交通、电力、通讯、宾馆等）方面有巨大改善，这一切需

^①参见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的“利用外资”篇，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筹集数额巨大的资金，远非国力和地方财力在短期内所能承担，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1979年至1988年末的10年中，我国兴办了15948家“三资”企业，^①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就达230多亿美元，其中，1979年至1983年累计为39.1677亿美元，1984年为26.50亿美元，1985年为55.7151亿美元，1986年为28.1404亿美元，1987年为35.04亿美元，1988年为52.97亿美元。详见表一。

“三资”企业在引进外资方面，不仅外资数额不断扩大，而且引进外资速度快。许多“三资”企业在协议签定后，上马速度快，效率高，资金使用率高。例如，中外合资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铝合金易拉罐制造企业，项目总投资为2680万美元，而直接吸收外方投资为938万美元。该企业不仅吸收外方投资资金数额大，而且，建设速度快，从1985年3月30日签定合同，只用了6天时间，合同就批准生效。整个项目采用边基建，边安装，边试产的先进方法，从基建施工到全面试产只用了14个月。按我国一般基建程序，一个大中型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时间，通常要1年以上，而该项目仅用了5个月。

(2) “三资”企业的兴办，为我国经济建设引来了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和先进设备。

“三资”企业的建立，在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传统型向高技术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例如，天津市在“六五”期间（1981~1985）共签定“三资”企业合同

^① 《1989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89年10月版，第191页。

表 1：1979年至198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统计汇总表

企业性质 统计值 年份	合资经营企业	合作经营企业	独资企业	合计
1979~1983年累计				
企业数目 (家)	190	1123	48	1361
协议金额(万美元)	31543	322992	37142	391677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17318	75845	8307	101470
1984年				
企业数目 (家)	741	1089	26	1856
协议金额(万美元)	106600	148400	10000	265000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25473	46502	1494	73469
1985年				
企业数目 (家)	1412	1611	46	3069
协议金额(万美元)	202970	349615	4566	557151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57908	58504	1295	117707
1986年				
企业数目 (家)	892	582	6	1480
协议金额 (万美元)	137518	135805	8081	281404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80447	79379	26033	185859
1987年				
企业数目 (家)	1395	789	46	2230
协议金额 (万美元)	195041	128262	47116	350419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148582	61996	2455	213033
1988年				
企业数目 (家)	3909	1626	410	5945
协议金额 (万美元)	—	—	—	529700
实际使用金额(万美元)	—	—	—	—

(资料来源：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利用外资统计表)